

高长路 著

下岗 忧思录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下岗 忧思录

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



L022621



(鄂)新登字 05 号

下岗忧思录

高长路 著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校对:邓常陈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837121) 印刷者:监利人民大垸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 12.375

版 次: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7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ISBN7-5354-1807-4/I·1379

定价:15.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下岗，开弓没有回头箭	(1)
一 下岗，爱你没商量	(2)
二 明天，是否轮到你	(9)
三 下岗，国企的一道风景线	(18)
四 百万职工走出国企	(29)
第二章 失业，世界性的难题	(38)
一 失业幽灵	(39)
二 世界“瘟疫”	(46)
三 新技术革命与失业	(51)
四 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	(61)
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失业	(67)
第三章 中国的下岗问题	(74)
一 下岗，从历史中走来	(74)
二 国企，工业化之梦与失业	(89)

第四章 下岗潮中的职工心态	(121)
一 下岗心态长镜头	(121)
二 挂着，挂着	(135)
三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142)
四 男人女人眼中的“下岗”	(147)
第五章 下岗，我们冷静面对	(158)
一 中国人的单位情结	(159)
二 直面对下岗	(166)
三 寻找新的家	(178)
四 再造一个美丽的家	(198)
第六章 再就业工程	(206)
一 工程启动：任重而道远	(206)
二 国际比较：寻找他山之石	(211)
三 下岗女工的再就业 一个沉重的话题	(223)
四 职业培训：打开再就业大门的“金钥匙”	(231)
五 劳务输出：向国际市场拓展就业空间	(239)
第七章 下岗，走上快车道	(249)
一 大趋势，大潮流	(249)
二 下岗，历史的转折	(269)
三 明天，没有下岗	(284)

第八章 下岗职工致富术	(291)
一 充电，充电，再充电	(291)
二 致富术“大拍卖”	(301)
三 农村，是知识青年的广阔天地	(313)
四 寻找市场的切入点	
· 有关职业的现状与前瞻	(320)
 第九章 下岗，拿起法律武器	(332)
一 下岗，给我一个说法	(333)
二 不能一走了之	(339)
三 职工福利与生活费	(315)
四 拿起法律武器	(352)
 第十章 保险，再造我家	(359)
一 中国的工资、奖金与福利	(360)
二 职工保险，向我们走来	(366)
三 保险，就是保护自己	(379)

第一章 下岗，开弓没有回头箭

整个时代和整个世界都注视着中国改革道路上的每一次举步；

整个历史也都在注视着一个大国的伟大复兴与崛起；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人、中国职工，注定要与共和国同甘共苦，共同担起它沉重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中国产业工人曾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早在 70 年前，中国革命先驱们曾描述道：在中国这块落后的土地上，唯有产业工人，才是最彻底的革命力量；革命，只有凭借产业无产者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高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中国工人满怀激情地投入每一个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时代。

斗转星移。半个世纪的光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浪花一束，而对于中国产业工人来说，却意味着太多太多的付出和嬗变。

40 年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三铁一大”——“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大锅饭”被推上了改革的浪尖；

再一朝醒来时，人们竟然发现不得不要面对一个他们从来都不敢想到的现实——下岗！

下岗，这个多少有些含混、暧昧的称谓，也许正因为它过于宽广的内涵，人们一时竟无法想透它确切的含义。

恩格斯说过，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使无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人。

今天，难道要被劳动抛弃？！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也是胜于雄辩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想实现实质性的进步，下岗，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下岗，也是企业职工重新择业的一次宝贵机会。

“不要拒绝改变，拒绝改变就是拒绝进步”——一位伟人如是说。

弓张满，箭在弦，开弓没有回头箭。

面迎下岗大潮！

一 下岗，爱你没商量

下岗之潮滚滚而来，却并非是无源之水。中国工业化的艰难历程曾一度有过史诗般的壮丽，也有过神话和梦境。新中国的成立也似乎在宣布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大变革时代的来临，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演绎绵延了数千年的悠悠田园牧歌注定将被一片隆隆的机器声淹没和取代。我们没有权利和能力来评价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某种意味上的后退，人类长河中的重大主题，哲学层次上的抽象追问，在每个特定的时代往往是苍白和乏力的。饱经坚船利炮之苦、饱受践踏蹂躏之辱的中国人体会到了工业不兴的苦楚，毅然宣布中国要走工业化的道路，而且是重工业先行，轻工业随后，农业则作出反哺工业的巨大牺牲。这套体制表面上看是几乎全盘沿袭了苏联模式，但其背后却蕴含着历史的必然。甚至，这套体制的推行除了强大的辉煌目标的感召之外，还有一种革命时代的激情。当时曾有高级领导人提出过异议，说中国不同于苏联，中国是农业国，重工业

是低劳动力吸收弹性的，中国不能以过大的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历史的事实却是，这种声音竟没有公开表达的机会，即使它是来自于一个有崇高威信的革命先辈。几十年后，在追溯下岗的最初源头时，这一段小插曲也许是不能遗落的。

工业化是人类一段壮志飞扬的美梦和理想。西欧先进国家从17世纪开始踏上这条艰难历程，在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之后，历时300多年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的伟大使命。而中国，却以独有的浪漫主义激情，在新中国之初便造就了1957—1958年的大炼钢铁时代。当激情退却，在一堆堆钢不成钢，铁不成铁，支离破碎的废铜烂铁而前，中国工业化之梦被无情地碾碎了。中国人开始走向现实。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几千年农业文明的顽强生存与发展已经为这片土地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一时的工业化激情纵使可以短瞬间掩盖这些痕迹，却注定不得不面对现实。农耕社会留下的是缓慢平稳的节奏，以及这套社会规则内化以后形成的一种习惯权力和习惯心态。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这种习惯必将以变种的形式遗传下来，这就是被称为“三铁一大”的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大锅饭。

这“三铁一大”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从历史中走来，走在历史中间，它的功过是非很难以三言两语阐释清楚。除了前面所讲的农业社会本质特点的遗传之外，在特殊的中国现代背景下还有更多的内涵和根源。中国的革命，从古代到近代乃至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俯拾皆是。历史学家自然有他们严格的史学解释，但我们通俗地来看待历史时会发现，中国人似乎天生就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特质，现实主义使中国人在历次革命中密切注视自我地位与利益的改变，许多的起义革命成功之后不能深入持久，其

根源之一便是没有带来革命人民地位的根本好转，而领导者又自顾于一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中国的现代革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精锐之师相抗衡，而最终又奇迹般地取得了成功，中国工人阶级付出的巨大代价可想而知。革命胜利之后，熟谙中国历史的领袖们不可能不对于革命的守成作出深沉的思考。“三铁一大”或许便多少带有承诺的意味。

而中国现代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又要求安定和财富的巨大积累，以完成工业化之初的启动资本，因此严格的户籍管理、体制分割成为需要，这也为“三铁一大”提供了背景和合理性。

某些富于革命激情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主观理解和诠释也无形之中在加固某种社会现实。40年来，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失业”乃是一个同“资本主义”“娼妓”等间的字眼，视为洪水猛兽，避之惟恐不及，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不惜以通货膨胀或低的生产效率维持着高就业甚至充分就业的辉煌。在我们的生活中，连救济金都领不到的人都未被划入失业人流，却名之为“待业者”，等待就业就不是失业。很长时间，我们总喜欢善意地在文字上作些文章，以求得某种平衡，但最终被骗的对象正是自己。

正是这种体制，40年几乎没有变动，尽管这种体制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它赖以发挥积极功能的条件已经随历史风尘烟消云散。

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打开了中国全面改革的闸门。改革势不可挡，而其实是现实非改不行。直到此时人们才从各种角度多少带有试探性地对城市就业、国企体制进行解剖和观察。

人们对于国营企业的效率开始提出疑问。全国总工会对15个城市417个企业的20.3万名职工的调查表明，只有13.9%

的职工积极性充分发挥，而发挥不足的则达到 86.1%。另外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国营企业真正的有效工时仅占工作时间的 40% 左右，也就是说以每天 8 小时每周 6 天的工作时间计，每周的有效工作时间仅有 19.2 小时！

恐怕大多数国营企业的职工自己都习惯了这样一种工作场景：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结果五个人都不干，上班时间打打牌、聊聊天，织织毛衣睡会儿觉，一杯清茶，一张参考，悠闲一天。在“三铁一大”荫庇之下的正式职工正在蜕变成企业的贵族，大量脏、累、苦、差的活儿没人愿干，没人去干……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嘛。因此，一方面是国营正式职工养尊处优，另一方面，企业外聘劳动力及其费用大量增加。中国国营企业的特殊地位使企业很难称之为企业，干部几乎不用为所谓企业效益操心。而客观上，企业内部论资排辈，子承父职，近亲繁殖，劳动岗位世袭化、亲属化，使国营企业带上了中国大家族的味道，“牵一发而动全身”，谈何改革管理？！

终于，国营企业的“体面”被改革浪潮冲破，国营企业“龙头老大”的地位开始面临挑战。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以突飞猛进之势无孔不入，挤抢国企所曾占有的份额。国营企业本身触目惊心的亏损也使得政府强烈地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溺爱你啦！国营企业必须开始追求效率，要走向自负盈亏，走向变幻莫测的市场。要想生存，必须改革，即使难度再大，哪怕是带着些许无奈，在“生存还是毁灭”的时代命题面前，也只有选择前者。

1987 年，湖北省的国营企业一年内辞退、除名 1.4 万全民固定工；

到 1988 年夏为止，上海已有 3 万人沦为失业救济金领取者；

1988年8月新华社报道说，全国至少有30万全民固定职工一次性下岗；

.....

几乎是自发的，在没有规范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各地区、各企业在纷纷行动，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勇气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对于国企改革尤其是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来说，1992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的年初，《人民日报》披露了政府总理李鹏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李鹏说，转换经营机制，重点之一是打破企业“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和“大锅饭”。这无疑代表了政府的决心。一时之间，国营企业打破“三铁一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千万职工无不注目，开始揣测自己的命运和前途。1992年第2期的《半月谈》发表评论员文章《痛下决心砸三铁》，文中指出：“所谓三铁，即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乃若干国营企业的痼疾。”“它使得企业和企业的工作人员没有危机和压力，很少竞争的动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许多国营企业活力不强，效益不高，处境艰难。”接着，国内各大报章、杂志纷纷发表文章，介绍破“三铁一大”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保证。时任劳动人事部部长的阮崇武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必须从改变和调整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消除目前这种‘国家包揽、行政隶属、身份差别、终身固定’的不合理状况。”这就意味着，在破三铁之后，企业全体职工必须在平等、公平的环境之下，竞争上岗、优化组合。企业也要走上市场，企业与企业之间也要展开充分的竞争，而竞争的标尺便是效益。效益差则只有一条路——破产，则意味着全体企业人员必须集体“下岗”！

有着深厚工业基础的上海又走在了全国前面。1992年上海

市便拿出企业劳动改革的四个试点方案。拥有职工 25000 名的上铁三厂，改革到位时，有 5000 名职工“富余”！而整个上海国营企业按照保守的定岗设计测算，通过竞争上岗、考核上岗，将有 20% 以上的干部、职工下岗、转岗乃至待业！这尚不包括深化改革的企业破产时的大规模人员下岗。

1992 年北京市 23 家企业，20000 名职工中有 1160 名职工离开企业，下岗！

1992 年 12 月哈尔滨“赛格”电子公司三分厂 270 名职工因产品质量不过关，全部被停发工资，全厂待业近一年！

.....

捷报频传。不，不是捷报，而是战报，这是中国企业界的一场战斗，一场异常艰苦的战斗，甚至是一场决定生死的战斗！

中国企业太疲惫了，改革开放的中国要赶上现代化工业化的末班车，要追赶西方同伴的脚步，要证明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光荣和先进——中国企业，准备迎接一场战斗，一阵巨痛。

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胆略与魄力！

也许历史会作出这样的评价：从 80 年代末开始的下岗浪潮恰恰是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猛醒和自救的壮举，是中国企业为历史的欠债开出的最后一张支票，漫漫长途而今迈步从头越！

也正是在此时，在中国报章的某些角落里开始出现了“失业”的字眼。90 年代初，一份不算权威却不能不说带有某种先锋意味的《经济日报》终于明文写出了“失业”的新定义：凡在劳动年龄以内，有劳动能力而没有报酬工作的即为失业。这样一个平常和自然的定义，我们却走了几十年！而且时至今日它似乎仍带有某种避讳的色彩，不论官方乃至劳动者都不愿轻易开口说出。

这也给有关失业的统计提供了困难。在政府报告里的数字常以 2.0%、2.5%、3% 来表示，而稍有经济学常识的都会知道，经济学上的自然失业率为 4~6%，也就是说处在这个水平的失业率能在经济的自然波动中调节自动平衡，而低于这个水平则意味着充分就业——当时的我们似乎未走出充分就业的神话！

关于失业人数的猜测也众说纷纭。1988 年初，新华社首次播发的电讯稿称：近三年劳动改革中，至少有 30 万人失去了铁饭碗！而到 1995 年，1996 年，1997 年，随着改革的一步深入，各种口径的统计数目也层出不穷，有的称中国有 200 万人失业，有的称 300 万人、500 万人失业，最多的称中国企业超员人数在 2000~3000 万之间，超员的人终将下岗失业！早在 80 年代末，阮崇武部长便说到中国至少有 7000 个职业介绍所为下岗人员服务。作最保守估计，每个职业介绍所的顾客为 1000 人，那么，中国的失业者达到 700 万人次！

的确，下岗和失业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既是一次沉重的痛苦的选择，也是唯一的有希望获得新生的机遇。这是一笔巨大的代价，却又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中国的今人终于勇敢地捧起了前人酿造的苦酒一仰而尽，然后，冷峻地望向前方，坚毅地迎接挑战了！

风萧萧兮易水寒，举杯壮行，中国工人兄弟姐妹们终将会有美好的明天！

我们深知，下岗，简简单单两个字，会包含着多少的酸辛苦楚，多少激荡坎坷，但是沉重而冷峻的现实告诉我们：一切，都要坚强而对，我们面对挑战相信明天！

二 明天，是否轮到你

文化衫兴起那阵儿，有人在背上印上一行字：“点儿背，不能怨社会。”当下岗的现实真的光顾到你时，你真能有这般轻松洒脱吗……

应当说，近半个世纪来我国工人阶级是幸运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原有的800万工人翻身得解放，400万失业工人全部走上岗位，解决了旧社会解决不了的失业问题。随着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就业职工的队伍迅速扩大。就第二产业职工来说，从1955年的2000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14315万人，40年扩大了7倍。职工只要一进工厂的大门就“挣脱”了失业的威胁，终身无忧了。只是近几年，国有企业由于经营管理的转制、增长方式的转型、存量资产的重组和产业结构的重调等原因，需要剥离出一些职工，这样才有了职工下岗的社会新问题。

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对50年代包下来保证就业和对过去捧铁饭碗不辞退的情况来说，是新问题。过去城镇人口失业，也只限于待业，即那些等待劳动部门安置工作的青年。现在城市失业人口的构成除了原来待业的人员之外，新加了下岗职工。虽然下岗职工只是暂时的，但在获得再就业机会之前总是属于失业范畴。从另一个角度看，职工下岗也是“历史后遗症”。1958年大跃进，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由1957年的2450万猛增到4532万，几乎比上年翻了一番。1959年、1960年又分别增加29万、483万，尽管1960年秋季开始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逐步进行压缩性调整，从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共压缩“下岗”全民所有制职工1751万，但

增长仍然过快。在此后直到改革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全民所有制工人总数也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总趋势。城市经济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冗员现象逐步凸现出来。一些效益不高、亏损和濒临破产的企业，早已有不少职工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在厂在岗的失业工人，现在只是将这部分职工由在厂下岗，转为离厂下岗而已。所以，职工下岗既是新问题，也是老问题。

明天，是否轮到你？

公休日，到外面去逛街，每次碰上塞车，总能听到有人说：“唉，到处都那么多人，扔几颗炸弹下来就清静多了。”这种话很多人都说过，只是说时没想到他们自己。

对于改革，情形似乎有点儿类似。扔几颗炸弹只是太不认真的玩笑，而改革却实实在在。改革之初，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改革会让自己失掉饭碗——尤其是对于捧了几十年铁饭碗的老工人来说，感情难以接受。

老王是沈阳一家化工厂的老工人，已经在厂子里干了30年。每天他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有时也不计报酬地加点夜班。可以说，他是自始至终目睹着厂子的兴衰，把青春都献给了企业。而改革大潮涌来时，由于知识陈旧，跟不上技术革新要求，在优化组合、减人增效中，老王下岗了。怀揣着一大叠“优秀工作者”的奖状和证书，老王怎么也想不到，结果会是这样。

在北京市城建集团一公司工作了十几年的工人李彩平，同公司其他职工一样，还怀抱着“有了岗位就有饭吃”、“一辈子四平八稳守摊子”的职业观念。改革伊始，建筑行业立刻面临着由单纯的体力劳动向智力密集型转变的挑战，要求职工“一专多能”，“不断超越自己”。而对于李彩平说来，十几年来他只习惯了供料、递砖“一砖三弯腰”的简单工作程序。最初他还说：“反正是国家正式职工，是国家的主人，我不相信谁能去掉

我当主人的资格？”

然而，改革就要毁掉这种人的饭碗！下岗的现实摆在面前，李彩平才恍然大悟，立即报名参加了厂内转岗培训班，3个月勤学苦练，拿到了电工本，老李抹一把汗，才敢轻轻松松了口气，却又不得不考虑是否再培训点儿别的专长。

这就是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把我们每个人都逼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境地。为了不被时代淘汰，为了在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工作和岗位，也必须重新认识自我。

在改革的大潮之中，任何人都无法不丢弃原有的优越感或侥幸心理，正确树立生存的危机意识和时代紧迫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和适应这一点。总有人眷恋过去的安稳而不愿睁开眼睛看看现实，总有人抱残守缺，把自己的身份、后台拿来作掩护，要在改革中固守他们过去的一切。

改革以其摧枯拉朽之势来到时，有人忙于托关系找门路，有人端着饭碗在厂长家里赖着。然而真正明智的人，却从下岗的危机中挺起腰板，甚至未雨绸缪，及早地作好准备，勇敢地迎接挑战。成功者莫不如此。

张雅芹原来是承德市地毯厂工人，由于多方面原因企业停产了，她成了一名下岗女工。后来，她被调到第三塑料厂。她立志学一门技术为将来作准备，这是第一次下岗给她的启示。她便利用工作之余学习服装裁剪，并不断深造，请教名师，到80年代末时，她已经是集设计、裁剪、制作于一身的多面手了。终于，张雅芹所在的第三塑料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被迫停产，而这次张雅芹没有第一次下岗时的茫然无助，她毅然下定